

我为何写《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

李锦

这是一本揭示了金融信贷风险在中国发生、遏制和演变过程的书。研究这个过程,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进而明确发展方向。

因为我担任着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学生们关心这个“秘密”,总是要我讲述在这场危机中的遭遇。学生们把这些对话记录下来,再把我在博客上的观点补充进去,经过我的数度修改,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现在金融危机对全球市场的凶狠攻击已经告一个段落,在危机中疲于应对的世界也开始在这场浩劫后慢慢恢复元气。在这场危机到来时,充满了未知数,中国政府曾处于紧张而又严肃的对付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2008年11月提出的“四万亿”救市方案和2009年9.75万亿贷款的倾泻而出。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形势变化很大,很多东西已经形成定论,这些过程也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自次贷危机爆发至今,有不少关于次贷危机“真相”、“迷局”、“剖析”等内容的图书,从不同角度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其演变历程进行了分析。对危机的解读固然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但对那些想对本次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续影响有一个深刻认识的读者来说,需要有一本著作以更深邃的视角,动态地剖析这次危机,包括这场经济危机在中国引起什么反应,中国人是怎么度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人们也更希望了解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途有什么影响。

当危机不速而至时,人们曾经以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在四个月内,3.87万亿的贷款倾泻而出。连央行负责人也感到“出乎意料”。在这关键时刻,有一封近万言的意见书递到温家宝总理案前,提出中国已经出现信贷大跃进,极易引起泡沫经济,这种狂潮如果不及及时抑制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货币的灾难”。国家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加强金融监管,把速度控制好,把结构调整好,以保证积极的财政改革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健康地贯彻,以使金融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温家宝总理收到这封来自民间的信,高度重视,从头到尾划了很多杠杠,认真阅读而且要求有关部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这就是我在2009年3月22日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信。

我多年来一直在基层调查,在老百姓中跑,每年下乡200至300天,40年间大概如此。我关注中央政府的一举一动,细心揣摩着总书记与总理的每一次讲话,是属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当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我每天上网数小时,面对迅速奔到眼前的信息,觉出国家经济脉象的危急。我在忽然间发现“信贷大跃进”这个词,就像追踪的雷达发现一个亮点,便紧紧盯着。通过十天的观察积累和研究,我认为全球经济在朝夕之间陷入困境,看似令人难以置信,实质上则早已有迹可循;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及各国针对危机的救市行

为,效果并不那么理想;中国面对危机的金融拯救行为显得急促,有失控的倾向;这种贷款速度与规模似乎在制造一种新的风险与危机,将为中国发展留下极为久远的隐患。

从根本上说,次贷危机是美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作为世界经济金融基石的美元一再显示出其疲于应对的窘迫处境。美国政府依靠美元地位攫取全球财富的行径以及失去苏联这个主要对手后的恣意胡为,都一再动摇着美国自己的地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本已深陷财政危机的美国政府,更是因几项大规模救市计划的颁布和实施,而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财政赤字再次飙升。

因为金融风暴肆虐,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改革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4万亿救市计划和中国的市场的稳健恢复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这是正确的抉择,总体效果也是如此。其实四万亿只是一个引子,在整个2009年也只是投入8500亿,引起的“倾盆大雨”是9.75万亿的贷款。然而,这“救火”的速度来得过于猛烈,猛下药剂,使得中国固有的计划经济病一下子被引发出来。尤其是贷款“大跃进”的出现,形成了极大风险。我的生活基地是沂蒙山区九间棚村,我先后去过这个村庄76次,村支书刘嘉坤拉着我一次次帮他跑贷款,可是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闸门被紧紧地关闭着,国家办的银行总是帮助富人而不帮助穷人。巨量贷款惊人地倾泻出来,洪水似地涌向地方政府与企业,而不少企业则用这些钱来炒地皮,甚至自己办银行,导致贷款票据现象迅速上涨,这岂不是中国式的“次贷”?我感觉到国家高层并不了解这种新动态,自己心中不寒而栗,觉出另一种危机在向祖国扑面而来。当温家宝说到准备好“子

弹”的时候,我们便能感觉到中国政府因为财力雄厚而呈现出的坦然。然而,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子弹暴雨般倾泻时,效果如何?这种金融战争的局势如何,仗该怎么打下去?于是我奋笔疾书,提出了中国贷款速度问题、结构问题、效果问题、监管问题及其它种种隐患,最终提出数条明确无误的对策。温家宝总理吸取了我的意见,中央领导与几个部门也高度重视,纷纷组织研究。就在中央收到信之后的第11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信贷风险问题,一项项措施迅速推出来了。金融危机在中国只有一年半时间。到2009年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记者赵承的那次世界关注的采访,温家宝说,“我们年中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加以纠正,下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温总理说的“年中”,是指4月初至7月底这段时间。温总理是4月4日在我的信上做批示的,并因此引起一连串的反应,于是有了“下半年的好转”。这本书为这个发生、发现到“引起注意”的过程提供了佐证。

向温家宝总理上疏,陈述应对金融风险对策,只是我在金融危机中做的一件事,我是在这一年多的130多篇经济类文章中的一篇。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应对之道可圈可点。中国政府令世人惊讶的防御和恢复能力使中国角色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迅速上升为全球性角色。在为形势的好转而欣喜而赞颂的时候,我更为种种隐患的出现而担心和忧愁。我发现,金融危机并没有远去,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被转移被隐藏。于是我写出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的另一个结构性调整需要从收入分配入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贫

富差距越来越大,北京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中国的资源消耗越来越多,而整个民族自主创新的能力提升过慢,这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GDP增长主义”渐渐成为引发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经济泡沫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的隐患。幸好,我们党和国家正日益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

我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恪守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主要动力的思想。在2008年9月山东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曾大声呼吁,中国应该进入以消费主导型的社会。2010年4月,在北京一次理论研讨会上,我再一次呼吁消费主导型社会,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播出了我挥舞手势呼吁的镜头。我总觉得很多智者提出的消费刺激经济,是一种浅表性的理解,思维还停留在单纯经济增长的窠臼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陷入方法论窠臼,我们需要一种“方向论”的思考,需要经验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我的看法是中国应该进入消费主导型社会,社会形态要有改变。这样带动中国字头的大喊大叫在近年有十多次,这些呼吁连续数次为北京的报纸以整版采用。我研究消费主导型社会论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的消费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源泉。这个理论是个大理论,迟早会进入党和国家主导理论的支持体系。

我们不仅要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为未来找出一条定位明晰的路来。从1992年7月通过双星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我的注意力开始从农村转向企业。1996年6月提出企业资本经营理论,对企业的研究愈发深入了。这两年,中国接连出现“汇源果汁事件”、“富士康事件”、“株洲太子奶事件”……我无不自以巨大的热情加以关注,都是以万言之上陈述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了30年,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市场秩序,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30年的改革进程还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的演进都是内生于它之前的那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国的市场体制,就不难发现,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结合、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串谋、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分割、行业进入的壁垒,所有这些促使下一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在金融危机期间对政府权力集中的理解由此造成对现有市场体制的扭曲,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等和经济效益损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向市场体制的不公正性开刀的经济学证据,更不用说公正本身就应该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到底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还是市场主导下的政府,千万不能以应对经济危机特定时刻的狭隘经验把过度的政府集权行为肯定为“中国模式”而大力倡导。集中化与市场化怎么找到一个结合点,找到一个中间度,是需要大智慧的,一切简单化、僵硬化、世俗化的思维都无益于历史进步。

(节选自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一书概论前半部分)

书讯



书评

与关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图书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描述和研究中国信贷风险发生、发展、得到遏制过程的书。作者给温家宝总理所呈的万言上疏,较早报告信贷危机真相,提出化解危机对策,引起中央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对于凝聚和统一高层认识,起了重要作用。本书揭开这一不被大众所知的过程。

这是一本当代智囊著作,因此也是一本思想信息含量高度密集的学术著作。

——冯加悦

李锦同志在书中强调独立见解和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我非常赞同。经济决策中智囊们保持理性的独立判断尤为重要。

李锦同志这本书对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是真知灼见,当然也有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作为一名学者,我很支持他独立见解和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李锦同志30多年写的调查报告曾得到30多位政治局委员批示,多是通过内部“奏折”形式而上的。经济学家们都很看重类似要报、领导参阅、内部报告等等发行量并不大但可直接通天”的渠道。而李锦同志给总理上疏的治理信贷风险之策,则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直接上疏坦陈己见。通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更不容易了。

——孙钱章

李锦《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是一本关于经济决策咨询问题的书,再现金融危机中一个学者的思考,为中国近几年经济形势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横断面,值得一读。

令人佩服的是,李锦在两年前已经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提出了建议。他不仅在信贷风险那封著名的信中,而且在许多文章中做了深入思考。他对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的关系、富裕与贫穷的关系,分析得都很到位,其间不少观点是他自己的东西。

李锦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没有止步于对金融问题的思考,提出一些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大判断、大思路和大建议,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赞同李锦的核心观点,我国未来发展,关键在于继续进行改革。

——王小广

李锦的几十年似乎一直处在逆境中奋而起的状态,他的声音开始总是微弱的、孤独的,然而最终屡屡成为时代的最强者,进入党的决议。事实证明,真理常常在孤苦而固执的李锦手里。他因为搞包产到户被调查过,因为提出“新阶层入党论”被批判过,他的大半生充斥着这种痛苦的经历。

《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一书对五大问题的论述,新见迭出,且多是干货,自成体系,实乃治国平天下之策,使人读了心里拜服。每遇大的转折李锦必站出来,提出新的对策、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充分体现知识分子与思想精英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

——王光明

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智囊妙计。智囊中最高为王佐之才,思路为国家所纳,自是大智囊。从李锦这本书看,作“智囊”要有对“异”的追求,千百次重复已有的定论,是当不了“智囊”的。

——周丽

当初,美国如有关眼宏大睿智明达之人,及时向美国总统指出美国贷款过热形势,也许美国是另一形势。现在,中国贷款狂潮起来了,上面又有几人发觉?李锦在这种狂热出现时,浇上一盆清水,足以使狂热者清醒。中国千万不能发生金融风险,感谢李锦防患于未然之明察与提醒。

——“随风若水”

《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对国家是份大礼,是成熟的思想结晶和智慧结晶。

——韩苏蔚

世上总有先知先觉者,而大多数还是处于麻木状态,不愿动脑不愿承担风险成为人们的生存常态。于是,便成就了先知者的磨难和成就。《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便是这种纪录先知者的发现思想之作。

——刘元涛

(以上摘自新浪网、人民网、理论网等)

书序

为避免信贷危机爆发提供可循之路

何众志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围绕这场肆虐全球的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专家、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引经据典,论著层出不穷。李锦先生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以其独到的研究视角、深入基层的调研材料、缜密的逻辑分析、精辟的描述和论断在众多著作中独树一帜。不同于其他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视角的论著,李锦先生的著作立足于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以研究中国式的金融危机为出发点,以美国的金融危机为启示,用详实的数据和事实深刻剖析了金融危机会以怎样的方式在中国演变。

众所周知,美国的金融危机始于大批次级房贷者违约而造成的以次贷契约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资金链断裂,归根结底是一场由信贷违约而造成的信贷危机。毋庸置疑,由于中国相对封闭的金融管理体系和外汇管制,国际金融危机不应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直接的冲击和震荡,以至于2008年主流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金融危机不会在中国发生。李锦先生却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得到启示,认识到中国庞大的救世计划及其信贷扩张可能引发的贷款违约问题。中国虽不会出现美国式的

大规模房贷违约,但中国式的潜在信贷风险在哪里?将以何种方式显现出来?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和危害又是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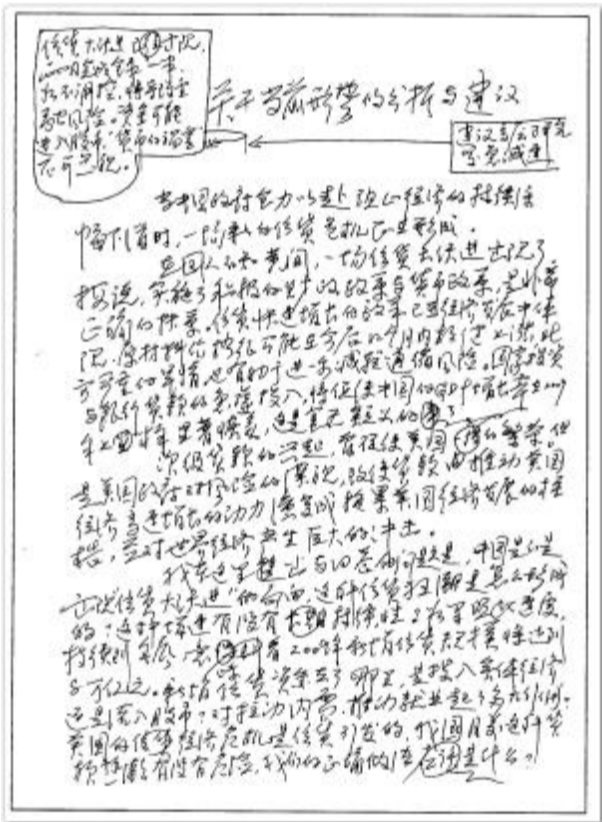
李锦先生的著作以给温总理的万言谏言书为引导,将焦点集中在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推出的四万亿的救市方案以及由此引发的2009年银行9.75万亿的信贷投放,李先生用“信贷大跃进”来形容这样天量规模的信贷扩张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李锦先生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单纯的巨额贷款增量是不足以引发中国式金融危机的,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新增贷款的投放去向和结构。我认为,对信贷投向结构问题的深刻论证和剖析是全书的精髓,不仅充分揭示了中国式潜在信贷危机的根源,同时也为避免信贷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循之路。

通过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李锦先生痛心地发现,新增天量信贷的大部分并未流入有迫切融资需求的、真正体现实体经济活力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而是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呈现出了“两头热一边凉”的局面。对由此引发的票据融资和地方政府信贷风险等诸多社会问题李锦先生在著作中都做出了全面的精辟分析。例如,2009和2010年被广大民众诟病的央企地王和房价暴涨现象,2011年的高通胀都跟信贷投

向结构失衡有着直接关系。诸如此类的对由经济问题导致的社会民生问题的关注也是著作的一大亮点,反映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对于中国式潜在信贷风险的表现形式,李锦先生的论述和分析尤为精彩。李锦先生以一个资深新闻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的事实为依据,对中国式信贷危机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信贷风险主要体现在一是票据融资风险,二是地方政府信贷风险。李先生指出,票据融资作为中国特有的金融创新,其乘数效应所产生的危害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衍生品,必须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治理。而地方政府搭建的形形色色的投融资平台更是可能诱发政府信贷危机的导火索。由此让我联想到近期经常听到看到的中央关于清理整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报导,李锦先生在著作中对这一政策的根源和背景做出了深刻的剖析。

作为一名对金融危机密切关注的金融学者,我完全赞成李锦先生关于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论断。我甚至认为,金融危机正在以更加肆虐的方式蔓延全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金融危机正在由2008年发生的个人、银行、公司层面的信贷危机深化为国家主权信用危机,具有更强的破坏力。这由2010年爆发的欧洲主权



2009年3月,李锦写给温家宝总理信建议书的手迹